

美国众议长选举闹剧台前幕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河

新年伊始,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张”便经历“疯狂一周”。原本没有悬念、程序性的议长选举演变为一场百年未见的尴尬闹剧。

经过5天15轮表决,经过党内激烈争论达成利益交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最终当选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为何迟迟无法得到足够的党内支持?这场议长“难产”风波将对美国未来政治生态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



肖河

问:麦卡锡为破局采取了什么手段,最终如何通过投票?

答: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特·盖茨和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劳伦·博伯特是此次狙击麦卡锡的强硬保守派牵头人,他们从中期选举结束后就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意图。对此心知肚明的麦卡锡也早早做了准备,那就是加紧向特朗普靠拢。无论是盖茨还是博伯特,都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前总统的表态无疑极具分量。

对麦卡锡有利的是,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声望在中期选举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党内地位有所动摇,因此很有兴趣和麦卡锡“结盟”。在议长选举的前一天,特朗普专门表态,称他相信麦卡锡能够在议长的职位上做出成绩,甚至可能做出伟大的成绩。

麦卡锡还刻意结交担任过“自由党团”主席的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在中期选举后还让后者当上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可谓特朗普在众议院的头号支持者,不仅在历次弹劾中都坚决支持特朗普,还是个“大选结果否定者”。有了特朗普的喊话和乔丹的居中斡旋,麦卡锡也就有了以拖待变、打持久战的底气。

不过,光有特朗普的背书和乔丹等人士的斡旋还不够。在前两天11轮投票中,约20名“反麦卡锡派”始终坚定不移地把票投给了麦卡锡之外的共和党众议员,导致麦卡锡的得票一直落后于众议院少

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

面对这一局势,麦卡锡抓紧了和反对者的谈判,一口气做出大量承诺。在规则上,麦卡锡允诺将支持限制议长权力,允许单个议员提出投票罢免议长的动议,同时答应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给强硬派保守派三个席位;在政策上,麦卡锡同意推动更加强硬的削减联邦预算支出议程,包括在提高债务上限时自动触发减支,将2023财年的支出控制在2022财年的水平或以下,以及一旦国会无法就新一年支出达成一致时,自动按照现有支出总额的98%执行等;在人事安排上,麦卡锡担心激怒其他重量级议员,没有直接答应强硬保守派的职务要求,但表示不会因这场风波惩罚任何反对者。

在敲定了妥协方案后,从第12轮投票开始,“反麦卡锡派”中不断有人转而支持麦卡锡,投给其他人的票数从20锐减到7。到第14轮时,盖茨和博伯特由投给其他候选人变为投“出席”票,使得麦卡锡只差一票即可当选。

之后,特朗普又专门给盖茨打了一通电话。在最终的15轮,包括盖茨和博伯特在内的6人均投了“出席”票,一面兑现了“绝不支持麦卡锡”的承诺,另一面降低了麦卡锡当选的门槛,使其如愿举起了众议院议长的木槌,也结束了这场政治“难产”。

2 靠拢特朗普 麦卡锡勉强过关

1 “青春枪手”遭极端保守派狙击

问:作为共和党的众议院领袖,麦卡锡为何迟迟无法得到足够的党内支持?

答: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幕后,由众议院共和党右翼强硬派领头的约20人小团体“自由党团”一直拒绝给麦卡锡投票,导致议长“难产”、众议院“瘫痪”。回顾共和党几位核心人物的政治经历就会发现,此次麦卡锡参选遭遇“自由党团”狙击绝非偶然。

2006年,凯文·麦卡锡首次进入联邦众议院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第22选区众议员,接替了退休前辈比尔·托马斯的班。初入政坛时,麦卡锡就是给托马斯当国会助手,之后在2002年选上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2004年成为州少数党领袖,最终踏上全美的政治舞台。

从任职年限上说,麦卡锡算不上多么资深,远远比不上担任联邦众议院长达40多年的南希·佩洛西,但是他在登上全国舞台后仍然保持着在党内一路蹿升的势头,很快就位高权重。

2009年,凯文·麦卡锡接替埃里克·坎特担任共和党众议院副党鞭,2011年担任党鞭,2014年又接替坎特成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在众议院共和党人中的地位仅次于当时担任议长的约翰·博纳。在这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麦卡锡和同样年轻气盛的坎特、保罗·瑞安组

成了一个自称“青年枪手”的小团体,他们三人也被视为未来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袖。

然而,在从“茶党”兴起到“特朗普主义”的大潮之中,三位“青春枪手”都显得有些“跟不上形势”,简单来说就是不够“右”。坎特是三人中第一个出局的。2014年,他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位置上输掉了党内初选,大败于“茶党”候选人戴夫·布拉特。究其原因,部分在于一贯保守的坎特在担任众议院领袖后变得更加温和,失去了弗吉尼亚第7选区的青睐。“草根”掀翻党内“大佬”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预示着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将面临极端保守派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紧接着,麦卡锡在2015年栽了跟头。在坎特辞职后,麦卡锡接任多数党领袖。次年,众议院议长博纳宣布退休,麦卡锡自然想要顺理成章地由国会共和党二号人物变为一号人物。然而,由于麦卡锡之前在媒体上批评国会中的共和党同僚,称他们大力调查“班加西事件”,目的是为了搞垮希拉里的选举,再加上在其他一些议题上不够保守,“自由党团”在选举前公开反对麦卡锡成为议长,迫使后者退出了选举。

最终,当年是瑞安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要职上被直接选

为议长。然而,瑞安的好日子也不长。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共和党内的极端右翼浪潮推至高峰。瑞安虽然在很多议题上与特朗普相互配合,被指责“曲意逢迎”,但最终两人还是在总统是否应该解除“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引发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强烈不满。2018年,瑞安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理由是“厌倦了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大环境”。

从坎特落马开始,共和党内的建制派领袖在过去近十年中一直在承受着党内极端保守化的强大压力,只要表现出“斗争不坚决”的苗头,就可能遭受来自选民和同僚的严厉政治惩罚。2015年吃过亏之后,麦卡锡更加注意维护与党内极右翼的关系,但是仍然不免落下让人攻击的口实。在2021年初的冲击国会事件后,麦卡锡一度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虽然之后麦卡锡亲赴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冰释前嫌”,但在其反对者口中,这恰好证明麦卡锡本人“毫无原则”,唯一兴趣只是“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

在此次议长选举中,“自由党团”中的强硬保守派展开对麦卡锡的持续狙击,既是发泄对其个人的不满,更是为了要在党内扫清建制派的“妥协主义”,严厉推进极端保守议程。

3 “绑架式”缠斗未来还将继续

问:众议长“难产”风波及其背后博弈,将对美国未来政治生态产生哪些影响?

答:对于绝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场风波可谓“无妄之灾”。一些共和党众议员也直言,不知道这些强硬保守派在反对什么。因为一些重大的立法问题不可能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单方面说了算。在民主党仍然掌控着参议院和白宫的情况下,马特·盖茨等人

主张的强硬开支削减方案不过是空中楼阁。更何况,过去数十年来美国联邦开支的不断膨胀也不仅仅是由民主党推动的,共和党同样也为了各个议员的选区利益而不断增加“分肥”式的支出。虽然“自由党团”这样的力量可以惩罚个别与民主党妥协的政治领袖,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与民主党做交易,仍是共和党唯一可行的政治选择。

因此,此次议长“难产”风波可

能会刺激极端保守派的胃口,在未来继续提出“绑架式”的要求。如果这种内部缠斗反复出现,只会为共和党的地位增加不确定性。

至于麦卡锡个人,虽然登上了议长宝座,但是共和党的微弱多数地位决定了在未来两年内,他必须持续对极端保守派让步才能坐稳这个位置,这意味着建制派将更难发挥内外协调作用,国会政治也将更趋于极化。

个别国家对华过度防疫 不利国际抗疫合作



晋继勇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

中国新政利好全球经济

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的政策优化标志着“后疫情时代”的正式开启。中国宣布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取消全员入境检测等政策举措,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恢

复带来暖意,为国际人员交往带来了便利,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带来了动力。

然而,在中国宣布对于全球经济重大利好的这一政策之后,中国调整入境政策的消息也引发所谓“担忧”。甚至个别国家还以所谓中国“在分享疫情信息方面缺乏透明度”为借口,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单方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抗疫合作坚持三大原则

有效的全球抗疫合作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非政治化原则。全球抗疫合作需要各国积极的政治承诺,而非将疫情防控作为一种工具来追

求政治目的。疫情防控事关生命保护、生命伦理和经济发展。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操作是短视的。任何将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操作必将危及全球抗疫合作所必需的国家间信任和国际政治基础。

第二,科学原则。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同疾病的斗争史。在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中,科学是最关键的变量。任何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制定应该基于科学而非其他,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办法。

奥密克戎变异株跟既往的原始株和其他的变异株相比,毒性降低,传播速度较快,拥有较强的免疫逃逸能力,中国抗疫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基于这一科学证据之上。

第三,非歧视性原则。各国疫情防控措施要符合国际卫生法。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卫生法,《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各国不得实施有损于贸易和旅行的过度限制措施。各国负有“采取卫生行动时避免对世界交通不必要的干扰”的义务。《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四十二条规定,“所有的卫生措施都应当以透明和无歧视的方式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四十三条要求成员国明确公共卫生风险以证明强加于个人的公共卫生措施为正当。

个别国家做法站不住脚

显而易见,个别国家以中国“疫情信息不透明”为借口而采取的措

施是站不住脚的。针对中国旅客入境限制措施不但过度,而且具有歧视性。这些做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是对国际卫生法的公然无视。

各国的相关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如果借机搞政治操演和采取歧视性措施,不但不利于全球团结抗疫,而且对国际人员的正常流动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团结是抗击新冠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中国通过开展双边和多边抗疫合作,凝聚国际抗疫合作共识,破除疫情防控的“污名化”和“政治化”,成为全球合作抗疫的重要力量。中国抗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必将为国际社会协力抗击疫情提供新的动力,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